



國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

錢

穆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八)

錢 穆 著

1980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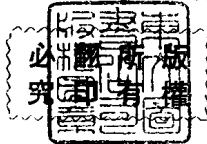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基本定價 肆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著作者 錢 莊
發行人 剛 穆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序

序

此爲余彙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之最後一冊。初，余在民國二十年秋始赴北京大學任教，卽開設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講論有清一代之學術。越二年，全部講義成稿，付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距今已四十餘年。稿旣成，又獲戴東原孟子私淑錄一種，乃戴氏未刊之稿，又章實齋未刊稿二十餘篇。時日軍已占北平，余藏其稿於衣箱之底，輾轉自天津抵香港，携赴衡山南嶽，又轉自昆明携赴成都；始刊布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有關章氏各稿，嗣經大陸再版，又分散入章氏之文史通義中；而戴氏一稿，則抗戰勝利後，迄未爲人注意，今以附刊此集中。

又余在成都，受政府之命撰清儒學案一書。時政府擬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其前三朝分囑他人刪約黃金兩學案爲之；清代以誨余，定時限，定字數。余在成都郊外賴家園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窮日夜之力依約草成。時適有友成都新識彭雲生教授亦治理學家言，赴西安，余懇其代搜有

一 / 一

開清代關學各家成書。雲生覓得近二十種左右携返，有清一代關學材料幾備，其中極多外面未流傳者。余撰學案此一部份，最自愜意。又余爲李二曲撰新年譜，凡二曲一生思想著作，分年編入，所化精力爲尤多。又余從四川省立圖書館及賴家園某氏藏書中得遍讀甯都七子之各書，自謂此一編亦甚得意。其次則爲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亦提要鉤玄，頗費苦心。竊意學案一書，此三編或稍有價值。惟其時生活，備極窮窘，中午喫麵湯，晚餐進稀粥，終未得白米飯入口。稿成不及另鈔副本，卽郵寄重慶國立編譯館。不意其他宋元明三朝學案之節本皆遲未交稿；而編譯館擬俟全稿交齊始付印。而日軍忽投降，勝利還都。余之學案一稿，乃由編譯館雇船載返南京；有數箱書中途沉沒長江中，余稿亦在內。僅有序目一篇，余寄稿前錄存，曾刊於四川省立圖書館之圖書集刊內，一鱗片爪，姑供想像者惟此已。

及余既撰朱子新學案，又草寫研朱餘瀟一書。其前諸家均已散入本編之第六、第七兩冊。此編所收，如顧亭林、呂晚村諸人，於學術史爲重見，但寫法微有不同；如陸桴亭、王白田諸人以下，則於學術史後又重寫。又有舊稿如顧景范、崔東壁諸篇，乃在北平舊作；本編最後章太炎一篇，則應中央研究院五十周年紀念所寫，彙收於此，先後亦逾四十年矣。回念前塵，不勝惘然。余患雙目不能見字，及今已近兩年。此編各稿皆由及門何君澤恆代爲搜集，又代校字；積年陳稿，已不能親讀一過，一仍其舊，未能續有所改定，幸讀者諒之。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孔子誕辰前兩週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內 容 簡 介

本書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之最後一編，皆屬有清一代。惟作者於五十年前早有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此冊各稿，皆在其後。前書所重偏在學術，以乾嘉經學為中心；此書所重偏在思想，極多為前書所未及者。最後康長素、章太炎所取材料，多涉及民國時代，有意考論民國以來七十年之學術思想者，窮源溯本，此兩人更為不可忽。而中國四千年來學術思想傳統演變之所及，則此書實為其殿。承先啓後，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誠為有志於此者所當研玩也。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民前十七年（一八九五）生。民元即在鄉村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至大學。曾任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西南聯大齊魯華西川大江南大學各校教職。大陸陷匪後，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民國五十六年，來臺定居。

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大綱、史記地名考。有關子部者，有孔子傳、論語新解、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關集部者，有理學六家詩鈔。其他不勝縷舉。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目次

序

一、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一
二、讀朱舜水集	一二
三、陸桴亭學述	二〇
四、顧亭林學述	五二
五、王船山孟子性善義闡釋	七四
六、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	一〇四
七、跋嘉慶乙丑刻九卷本讀史方輿紀要	一一〇
八、陸稼書學述	一一六
九、呂晚村學述	一三五
一〇、讀張穆著閩潛邱年譜再論尙書古文疏證	一五〇
一一、記姚立方禮記通論	一六四

一二、續記姚立方詩經通論·····	一八二
一三、王白田學述·····	一八六
一四、記鈔本戴東原孟子私淑錄·····	二〇六
〔附〕孟子私淑錄·····	二一三
一五、讀姜白巖尊行日記·····	二四一
一六、錢竹汀學述·····	二四三
一七、讀段懋堂經韻樓集·····	二六四
一八、記鈔本章氏遺書·····	二七四
一九、崔東壁遺書序·····	二八三
二〇、讀古微堂集·····	二九五
二一、羅羅山學述·····	三〇九
二二、朱九江學述·····	三一九
二三、讀康南海歐洲十一國遊記·····	三二九
二四、餘杭章氏學別記·····	三四二
二五、太炎論學述·····	三四八
二六、清儒學案序·····	三六四

一、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有清二百六十餘年的學術思想，可分兩個階段：自世祖順治入關起至乾嘉時代止爲前期，自道咸起至清室覆亡止爲後期。前期一百七十餘年中，正值滿清政權鼎盛之際，清儒在異族政權嚴厲統治下，於刀繩牢獄交相威脅之艱難環境中，雖有追懷故國之思，而憚於淫威，絕不敢有明目張膽之表示。途窮路絕之餘，不得不沉下心情，切實作反省研尋功夫。而多數學者被迫走上考據訓詁的消極路線，終生於叢碎故紙堆中，追求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少數較爲積極的學者，於研究經史義理之餘，直覺的或非直覺的披露了他們潛在的民族意識，或迫於良知，以一吐在喉之鯁爲快，爲被壓迫奴役之平民階層一抒正義之聲，對當道之統治政權，隱約晦昧的提出了批評的主張。此輩思想家乃在清代早期，開拓了一片新天地，其精神直可上追晚明諸遺老，間接承襲了宋明儒思想的積極治學傳統。道咸以後的八十餘年，則屬後一階段，一方面滿清政府的統治勢力，

隨着對外戰爭之連續失敗而日趨衰微，一方面西方近代政治思潮，隨着外國勢力之東來而源源侵入，由於上兩項因素的影響，乃使晚清儒家思想，爲之丕然大變，首倡變法之議的康梁以及領導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可爲本期之代表。本文僅就前期清儒爲思想界所拓之新天地，作一概括之解釋，至於晚期思想，則不在討論之列。

清儒學術，直承晚明而來，但未依晚明的路向發展。在晚明諸老心中，藏有兩大問題，一是宋明儒的心學，愈走愈向裏，愈逼愈渺茫，結果不得不轉身向外來重找新天地，這是學術上的窮途；另一則是身世上的窮途。晚明不比北宋初，正當宋代無事將及百年，社會文物隆盛，他們不甘再沒溺於道佛方外消沉的圈子裏，一時翻身來講人文大羣政治教育一切積極事業。他們心中只知道回復三代孔孟，這是全部樂觀的；晚明諸遺老則不然，他們是亡國之餘，子遺的黎民，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政治教育各方面都想從頭有一番仔細的認識，到底那些是有真正價值確可保存或發揚的，那些是要不得的，當前大禍，究竟由何招致，均須加以思索研尋。因此北宋初期的心情是高揚的喜劇式的，晚明諸遺老則是低沉的悲劇式的。北宋初期常見其昂首好古，只要把三代孔孟來代替魏晉隋唐與釋迦達摩，他們的心情常見是情感的，宗教的，與經學的。晚明諸遺老則在途窮路絕之際，重回頭來仔細審量與考察，他們的心情常是理智的，社會的，與史學的。但是晚明諸遺老的學術路向卻並未能順遂發展。第一是滿清的部族政權，很快安定下來，社會有秩序了，民生轉入順境，又朝廷刻意牢籠，威懾利誘，把一輩讀書人盡要拉入政治界，雖不斷有極度

慘酷的文字獄興起，但晚明諸遺老的悲劇心情到底是逐步消散了。而且拉入了政治界，又不許你認真作政治活動，只要你消極順命，不貪污，孤立安本份，教育更講不到，只須你應舉守法，如此則自不許你認真用理智頭腦來講史學。晚明諸遺老的史學，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理學，亦可說是一種新理學，他們要用史學來救世教人，現在則世已太平，人已安業，大家上奉朝廷法令，應科舉，守官職，一切有滿洲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禍殃，晚明諸遺老一片史學心情到此無可寄託。心情變了，學術如何能不變？但此下沒有大氣魄人來領導此學術之變，而且他們內心深處並不是要變，只是外面環境逼得你走委曲路。這有些像魏晉王弼何晏講儒學，阮籍嵇康講老莊，全是沒氣力，由外面誘導擺佈，並非內部激發推動，晚明諸遺老的史學，於是到清儒手裏便變成一種專尚考據的經學了。

經學本來帶宗教氣味，中寓極濃重的人生理想，但清儒經學則不然，清儒經學，其實仍還是一種史學，只是變了質的史學，是在發展路上受了病的史學。經學在外面是準則的，在內面是信仰的，因此治經學者必帶幾許宗教心情與道德情味，但清儒經學則是批評的，他們所研究的幾部經籍，只是他們批評的對象，他們並不敢批評經籍本身，卻批評那些經籍的一切版本形式與文字義訓。所謂文字義訓，亦只是文字的訓詁注釋，尤其是在與人生道義與教訓無關的方面。換言之，是那些隔離人生較遠的方面。他們治尚書，並不是爲的政治楷模；治詩經，並不是爲的文學陶冶；治春秋，並不是爲的人事褒貶；治易經，並不是爲的天道幽玄。他們只如史學家般爲幾部

古書作校勘與注釋的整理工作。再換言之，他們只是經學，而非儒學。東漢經學還有儒生氣，清儒經學則只有學究氣，更無儒生氣。總之是不沾着人生。他們看重論語，但似併不看重孔子。他們只看重書本，但似不著重書本裏所討論的人生。這如何算得是經學呢？

清儒研經之外，亦治史學，但他們的治史，也像他們的研經，他們只研究古代史，不研究現代史。他們只敢研究到明代為止，當身現實則存而不論。他們的治史，亦只爲史書做校勘整理工作，卻不注意史書裏面所記載的真實而嚴重的人事問題。清代學風，總之是逃避人生。魏晉南北朝時代之逃避人生是研讀老子釋迦，清代的逃避人生是研窮古經籍。

但清儒到底也有耐不住的時候，或者是他們的不自覺而對人生問題有所論列，則他們亦有一共同態度與共同意見。他們大抵反對擡出一個說法來衡量一切或裁制一切。換言之，他們反對思想上的專尊，或說人生理論上之獨斷。他們大抵主張解放，同情被壓迫者。他們的氣味，寧是反經學的，至少是非經學的，所以說經學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

清儒思想之常主解放，同情被壓迫者，可舉戴東原與錢竹汀兩人爲例，此兩人乃乾嘉盛時最標準的學者。戴氏偏向經學，錢氏偏向史學，而兩人都抱有一種平民的同情，解放被壓迫者的情調。錢竹汀經史小學無不精擅，其學卓絕一時，其集中似乎很少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問題，此處特舉錢竹汀，正好做一個不自覺而流露其思想態度者之代表。至戴東原則高言放論，可謂是一位耐不住而披露其思想態度之代表人。錢竹汀有春秋論，謂春秋誠是一部褒善貶惡的書，但其褒善貶

惡，只在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用不着另有筆法來做褒貶。他說：「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如此則豈非史書褒貶，正好在不褒貶，只直書其事以待後人之自下評判。這是何等平恕的見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並與錢氏同此見地。）竹汀又有大學論，謂

大學書與論語忠恕一以貫之之旨，若合符節。古之治天下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非忠恕之道。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也。

這又是何等平恕的政治理論。其實照此理論，根本即不認有自上治下的政治。竹汀又論尚書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作容，鄭玄作睿，竹汀謂未必鄭是而伏非。

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潛研堂文集卷五答問二）

今按此條殊可注意。據段玉裁說，思曰容乃今文尙書，思曰睿乃古文尙書，此屬古書版本異同。惟人之思想究貴深通，抑貴寬容，此則非關訓詁，實乃一極重大之人生問題，即所謂義理問題也。以常識言，既曰思想，自當主通，不當主寬。寬是屬情感態度方面的字，不是屬思想理智方面的字，故段氏說文解字注徑爲許叔重改字，不用思容也之原文，這是有理由的。竹汀亦小學訓詁大師，此處卻不免違背了他們當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主張，要據義理來決定訓詁。他告段玉裁說，若曰思主於睿，則恐失之刻深。（語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此已明明透露了竹汀自己對人生問題的見解。清儒常笑宋儒主觀，此等便是清儒亦不免於主觀處。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等語，宋明儒最所樂道，故宋明儒所唱，乃人生之高調，清儒則對人生好唱低調，乃說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只在此心能寬容。這樣的大口氣，大理論，到清儒手裏，只是平民化了，做了他們同情弱者的呼聲。但在竹汀書裏，如此等處，不過偶一吐露，不易多得。他們常常逃避此等問題，不肯傾吐直說。惟戴東原則不然，他竟大聲疾呼，公開地表示他的意見，遂有他的晚年名著，孟子字義疏證。疏證中最大理論在其分辨理欲，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謂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

而不顧之謂理。

宋儒程子朱子，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骸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

又曰：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罪，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

這些都是東原極憤激的話。其實他的立場，還是極平恕，還是同情弱者，爲被壓迫階層求解放，

還是一種平民化的呼聲。換言之，現在講經學，是社會的，不是宗教的。是學者的，不是教主的了。若我們再深一層求之，則清儒此種對於傳統權威之反抗精神，其實還似有一些痕跡可見其為沿襲晚明諸遺老而來。但他們的敵意，他們對上層統治者不能正面發洩，遂使他們的攻擊目標，轉移到宋儒身上。在晚明遺老只埋怨晚明儒學術誤國，現在則責備宋儒理論為上層統治者張目，作護符。他們只是卑之毋甚高論，求平恕，求解放，此乃乾嘉諸儒之一般意見，而非東原個人的哲學理論也。如上引，東原明指今之治人者云云，則情見乎辭，此亦是一種不自覺之流露也。

清儒反對宋學，一面固因他們新得了許多考據訓詁校勘的法門，確然在古經籍的整理上，可以越過宋儒。再則宋明儒是承接著魏晉南北朝隋唐以來長期的道佛思想瀰漫之後，而刻意要為中國政治教育各方面建立一正面積極的標準或基礎，而現在則宋明思想已成了學術界之新傳統，為上層統治階層所利用，故乾嘉諸儒對當時統治權之敵意，亦以攻擊宋明儒為發洩。所以晚明諸遺老對宋明儒的態度尚屬批評的，而乾嘉則幾乎近似反動。晚明諸遺老多半尚是批評陸王，乾嘉則排斥程朱。乾嘉的態度愈偏激，愈見他們內心波動之不自然。

總之乾嘉經學考據極盛時期，卻是他們內心極沉悶的時期。他們攻擊程朱，便證他們心裏之耐不得，重新要從故紙叢碎中回到人生社會之現實來。這一趨嚮，遂又從經學轉向史學。戴東原同時便有章實齋，樹起史學旗幟來和經學對抗，這依然是一種時代精神的委曲之流露。據章實齋自己說，當時經學考據乃承襲亭林一派上接程朱。而他的史學則是承襲梨洲一派上接陸王。此種